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概括,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作出的重要发展和深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创新和新发展。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

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经过长期艰辛探索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斗,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之后又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我国建立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实行按劳分配和计划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新建立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了当时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后来在“左”倾错误影响下,追求公有制越纯、比重越高越好,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经济改革从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三个方面逐步展开,并在理论上不断深化认识。

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城镇个体、私营经济及外资经济逐步得到发展。当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是“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在经济体制上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突破。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同时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时,首次提出两个“毫不动摇”。“第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首次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都重申并强调坚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两个“毫不动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

深刻认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及内在联系

林兆木

内容提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和

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内涵的又一次新发展。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标志着我们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可见,我们党对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内涵及其内在联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发展的。在理论突破和实践创新相互促进,党中央决策推动和基层群众创造相结合的生动实践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这一伟大创造的意义在于:党领导人民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觉运用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基本原理,积极主动地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和经济体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对生产关系各环节的完善提出新的改革要求,如此相互促进、循环反复,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所创造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雄辩地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并且能够持续调整完善,能够容纳社会生产力实现更大发展,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先进的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新论断新部署。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更加注重各项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联系和协同推

进,更加注重每项基本经济制度中两个方面的彼此协调和相互促进。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全面贯彻两个“毫不动摇”。这是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发展的基本经验。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居于主导地位,对于建设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保障金融、能源、粮食等安全,对于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抗击重大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都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内外贸易、科技创新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举足轻重。实践证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使我国经济具有独特优势。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引发产业变革和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下,发挥这种独特优势更加具有战略意义。近几年我国互联网应用等新兴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在航天、高铁、核能、5G移动通信、量子卫星、无人驾驶等高新技术领域实现并跑甚至领跑,就是一批优秀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各自发挥优势共同推动的。

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深化国企改革。经过多年改革,我国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融合,并不断发展进步,同时仍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劳动生产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偏低、国际化经营能力和发展后劲较弱、大而不强等问题。这就需要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服务国家战略目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完善国有企业法

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健全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需要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破除制约市场竞争的各类障碍和隐性壁垒,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建立规范化机制化政企沟通渠道,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实施重大国家战略。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全面贯彻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生产资料分配决定生产成果分配,公有制为主体决定了分配方式必然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决定了国家可以依法运用各类国有资产服务于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使劳动者占主体的全国人民从中直接受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需要管好用好各类国有资产,提高其运营或使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增加国有资产在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的配置;提高国有资本收益划转社保基金份额。需要以促进效率和公平相统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坚持多劳多得,着重保护劳动所得,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防止两极分化。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决定了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而各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正是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

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劳动是物质财富的重要源泉和产品、服务中新价值的创造者。劳动作为首要的生产要素,理所应当按贡献决定报酬,这在我国就是按劳分配。在初次分配中体现按劳分配为主体,需要处理好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的关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劳动者推动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实现劳资两利。资本、土地作为生产资料是物质财富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国有资本及土地、集体资本及土地、民营资本和外商投资等按贡献决定报酬,有利于扩大投资、增加就业、推动创新和经济增长,做大“蛋糕”,增加可分配的财富。在现代经济中,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落实这几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对于促进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生产要素对创造物质财富、国民收入的贡献,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和评价。因此,健全各类生产要素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必须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和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防止垄断、不正当竞争等对要素市场扭曲造成的分配不公平。同时,政府要合理调节各类生产要素及各行业各地区的分配关系。

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发展实践证明,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巨大优越性,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力保障。所有制和分配方式这两项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健全的前提和基础,又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来实现。三项基本经济制度紧密结合,相互联系、相互支持、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健康、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生物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生物安全,制定了一系列与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如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野生动物保护

加强生物安全立法。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必须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高度充分认识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高度重视生物安全立法工作,尽快推动出台生物安全法,加快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用法律保卫国家生物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特别是针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从生物安全立法方面深入思考如何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加强生物安全立法,需要全面研究全球生物安全环境、形势和面临的风险、挑战,深入分析我国生物安全的基本状况和基础条件,使立法既体现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

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郭兆晖

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也是国之重器”。随着我国在生物安全领域的科技投入不断增加,相关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但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推进生物安全领域科研力量布局,整合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医药卫生、医疗设备等领域的国家重点科研体系,布局一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加大卫生健康领域科技投入,加强生命科学研究的基础研究和医疗健康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加快提高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储备能力。

相互促进。近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但还存在一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短板和不足。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以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产权制度,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和扩大内需潜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有利于保护和激发投资者、企业家、创新者、劳动者和全社会投资创业、创新创造的积极性。要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类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完善和细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交易、保护制度规则,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完善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纠正资源错配、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企业优胜劣汰的关键。我国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定价,但要素价格市场化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展不充分,要素流动和市场化配置仍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要以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为目标,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重点健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领域的制度和规则。稳步推进自然垄断行业改革,严格监管自然垄断环节,加快实现竞争性环节市场化,切实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加强和改进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对政府和市场的重大调整,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从根本上破除要素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优化要素配置结构,提高配置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社会治理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

姜晓萍

责社会治理的责任体制,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在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的基础上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坚决破除妨碍社会治理顺利推进的各种体制机制弊端。拓展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建立政社互动、政企互动、政民互动的联动机制,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励社会组织、企业、公众多样化、多渠道、多层次参与社会治理,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共治”回答社会治理怎么开展的问题,即通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实现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实现“共治”,必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党在社会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破除社会治理中存在的体制机制弊端,提升政府主导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调动群众参与人民内部矛盾化解、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预警等对应等方面的积极性。探索创新基层群众自治实现途径,搭建便捷议事平台,提高基层群众自治活力和能

力。增强政府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引导群众依法维权、依法办事,同时充分发挥德治的社会教化作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快促进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深度嵌入社会治理全过程,构建精细化服务感知、精准化风险识别、网络状行动协作的智慧治理平台。

“共享”回答社会治理为了谁的问题,即通过社会治理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实现社会治理成果共享,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共享”,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在社会治理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探索将党的群众路线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动能,创新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机制,健全为民谋利、为民办事、为民解忧的机制,抓住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作者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共建共治共享从主体、路径、目标三个维度体现我国社会治理制度的内在逻辑和要素构成,对于实现社会治理理念科学化、结构合理化、方式精细化,彰显我国社会治理制度的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能否将我国社会治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回答好“共建”何以达成、“共治”怎样有效、“共享”如何实现三个方面的问题。

“共建”回答社会治理依靠谁的问题,即社会治理不只是党委和政府的责任,而且是社会各方的责任。实现“共建”,需要明确不同社会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和职能职责。要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明确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职能职责,健全政府负

提升公众生物安全意识。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需要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凝聚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需要提升公众生物安全意识。国家相关部门要加强对生物安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解读,新闻媒体要深入宣传我国生物安全形势,提升公众生物安全意识。要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从人居环境、饮食习惯、社会心理健康、公共卫生设施等多个方面开展工作,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加强生物安全国际合作。生物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要加强生物安全国际合作。要公